

中国社会三大特点及发展方向

□胡鞍钢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对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所表现出的非凡的经济成就羡慕不已，称之为“人类的奇迹”。另一方面，当他们面对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问题，又感到十分茫然、悲观。因而，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乐观派”，另一种是“悲观派”。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持不同的观点，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常常陷于十分矛盾、极其复杂的境地。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呢？我简洁地概括了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里的“两种制度”不是指“一国两制”如大陆和香港，而是指过去 50 年中国大陆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正是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了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例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2/3，但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比重只有 1/7 到 1/10 之

间。这种制度安排和公共财政分配的不公平性是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这里的“四个世界”是指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在各个地区中的反映。如果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做法，划分四个不同收入组，按照人均 GDP（实际购买力平价 PPP）衡量的话，“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组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2.2%；“第二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组的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根据我们的比较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即使在一个省份中，其内部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

在中国，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如教育、卫生与健康等）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职

业，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第一世界”还是出生在“第四世界”。许多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是从“第四世界”考上名牌大学之后才改变身份和生活环境的。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这种机会。

第三，一个中国四种社会。这里的“四种社会”，一是农业社会。至今，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德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水平。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商品率极其低下，这也是农民长期收入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二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其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三是服务业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及其政府部门等，其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

就农村而言，仍然是以农业社会为主。在乡村总就业人数中，农业就业人数占65.8%，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占13.6%，交通运输和商业以及其他服务业就业人数占16.8%，知识产业（教育、卫生等）就业人数不足2%。就城市而言，在总就业人数中，农业就业人数只占2.6%，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占27.2%，服务业就业人数占23.1%，知识产业就业人数占21.2%，还有20%以上的农民（大约有7000万—8000万人，有的估计达到1亿人）。

上述三大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的特点——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差距。这是我们思考和提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构想的基本依据与基本出发点。

我认为，中国21世纪的长期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是：

加速城镇化进程。应不断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使比较多的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其他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也能够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对此，中央已经做出了重大决策。这对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第四世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

几年前，经济发展政策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现在政策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对此，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从资源禀赋和路径相关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战略，它的发展路径是以开发资源为重点，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此也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越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无论是产业、产值、税收均依赖于资源的开发，当资源枯竭，或者是外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和价格波动时，往往使这些地区陷入困境之中。

这些地区必须对这一传统的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实行“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优先促进社会发展”以知识促进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逐渐从基于和依赖于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基于和依赖于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新型发展模式。

从长远来看，缩小中国地区发展差距，还有赖于形成和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鼓励而不是限制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鼓励而不是限制就业竞争，加快建立而不是拖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使劳动力要素，特别是专业人才能够“用脚

投票”。

从战略角度看，国家和地方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资本（包括外商投资）等要素向中西部流动。

加速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社会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花二百多年的时间，先后实行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社会的演进。中国有机会也有条件在农业劳动力占一半的条件下同时加快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的进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设想。它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在过去的 20 年间，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定义为 15~64 岁人口乘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翻了一番，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由占世界总量的 17% 提高到 24%。今后 20 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从高增长迅速转变为低增长甚至为零增长，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教育因素，通过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和卫生的投资以及有效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次，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普遍应用技术的社会。由于中国加入 WTO，大幅度地降低进口外国技术装备的关税与交易成本以及技术的外部性的规模效应，农业、工业、服务业都将普遍地使用、传播、扩散新的技术。丰富的人力

（下转第 74 页）

审视 CEO

□徐 冰

近来伴随着西方经济的低迷，CEO 的神话正在逐渐退去神圣的光芒。尤其是安然、安达信的破产，CEO 们的个人魅力显然受到质疑。已经有人对支配 CEO 的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信条”提出反诘，这些信条包括：公司务必要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需要英雄式的领导人物，经济复苏将会令所有人得益等。实际上，这些“信条”，有哪条不是我们想当然得来的呢？

当然，仅靠这样的诘问还不足以说已经又进入了一个“解构英雄”的时代，我们只是希望由此可以冷静地审视那些我们奉为“信条”的所谓现代商业理念。打破一个偶像，不等于打倒一个英雄。记得一个 CEO 说过，凤姐的失败是因她的权威还不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句凤姐的权威足够了以后她就是英雄吗？

而这就是“审视”。

很难说 CEO 这个词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文化精神。我看过很多这样那样的 CEO 表演，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仍然无法弄懂 CEO 究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假如要用一个或几个简洁的词来表述一下 CEO，我似乎只能找到几个很不现代的词汇，比如，英

雄比如领袖……

现实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判断，我们有多少人不把这三个字母看成是一种领袖的化身呢？与此相对应，人格魅力这个词频频用来形容一些大企业。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企业和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中创造着有我们独特痕迹的现代商业文化。

这到底是一种创造还是一种误解？因为如果这一切是真的，我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却实实在在地发动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不能说这种现象是我们独有的，其实，中国人还是跟外国学来的。有资料显示，在那些最具独立精神的国家，这种英雄崇拜并不比我们弱到哪里去。惟一不同的是，我们还在为弄清 CEO 与一把手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时候，一场新的毁神风潮已经在大海那边开始了。

据有关媒体报道，美国的《财富》杂志在一篇报道中总结出了 CEO 们的十大“死穴”，其中不乏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诸如“骄兵必败、顽固僵化、抱残守缺、过于激进、冒险、疯狂并购、导致‘消化不良’，遇到挫折时急于求成、董事会职能不健全”等。但是最引起我会心一笑的还是一个外国人的话，如问任

何一个 CEO：“公司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毫无疑问 答案是‘我们的员工’。同样 对于‘公司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时 回答是‘独特的企业文化’。”

然而，盖洛普公司资深研究员马科斯·巴金汉说：“极具讽刺的是，你几乎无法找到一位不论强大的文化是取得优势的 CEO 同时，你也很难找到一位知道文化优势在哪里的 CEO。”

是不是非常精彩？

当看到这样的描述时，你大概就不得不为人类的童心未泯而震撼。又一个“皇帝的新衣”的当代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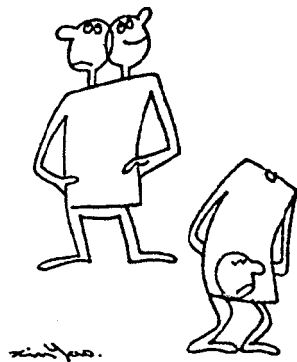
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本来一个纯粹的商业模式的革新，怎么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模式？也许我们的确是处于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西方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创造了商业神话的同时，在人们的精神深处也留下了荒漠般的创伤。消解神话、消解英雄 客观上也为创造英雄留出了巨大空间。实际上，政治领域的彷徨也为经济领域的凯歌高奏提供了契机。更别说网络时代一开始就是以神话般的大抒情拉开序幕的。那个比尔·盖茨 本身既是一个神童 也是一个神话 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神话和神童的追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 CEO。紧跟着 就是 CEO 们遍地开花。

在我们中国的 CEO 的心目中，

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通用的杰克·韦尔奇。这个老头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力挽狂澜上，还表现在他那套显然被奉为现代企业圣经的理念上。再加上他的这套理念被出了书，就愈发让人感到神圣。我不止一次听到某个中国 CEO 说，他最近在看的书就是这个老头的。但是 我一直没有听到、看到 中国 CEO 们关于读这个老头的书的心得体会。

当商业的神灵遍布我们的生活时，你对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吗？几十年前，卓别林就在他的电影里把大工业时代的每个人都定义为螺丝钉了，现代的人们，显然没有看懂他的电影。并且在一种更为玄妙的敬畏里 更自觉地扮演螺丝钉的角色。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无事切莫胆大，有事切莫胆小

郑辛遥画

选举在中国

□蔡定剑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论”，对此持否定态度。“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程度？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包括经济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等多个代表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于去年底公布调查结果。

中国人素质低，搞不了民主？

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选举的态度越积极，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选举的意向性态度。

另一组问卷调查表明，选民投票的积极性与选民意向性态度是有差距的。实际上，主动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到50%。主动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另一方面，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

比例提高。文盲为12.5%，小学、初中为14.4%，高中、中专为18.3%，大专以上占24.2%。

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参选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可能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政治因素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调查表明，政治身份越强，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如共产党员比共青团员和普通群众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共青团员对选举表示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24.8%，普通群众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2.4%，共产党员只有11.9%。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人。

但是，参选态度与政治因素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如：政治环境影响；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

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态度对被选举对象的信心 选举行为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实际上未必会积极投票。调查统计表明，大学生、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场合下的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

所以，用公民素质高低来判断公民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20世纪90年代，当农民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高素质的大城市居民却无视于此，在投票箱边呼呼大睡了50年。

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投票。如果把选举制度建立在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觉悟基础上，你就很难解释在西方一些国家200年前就开始议会直选。难道说200多年前那些流亡、放逐到北美大陆的异教徒、罪犯和流浪者比今天我们经过50年先进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觉悟还要高吗？他们在200多年前直选了国会议员，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民只能选举村长吗？所以，以公民素质高低来解释选举制度的推行是很荒谬的。

大学生和农民， 谁更积极选举？

对大学生和农民这两个群体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作一比较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

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是最关心政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从理论上说，是选举最积极的参与者，其选举积极性态度肯定是名列前茅。但是调查表明，大学生的选举积极性并不高，常常比农民还低，准确地说学生参与选举是很不稳定的、很矛盾的。他们有时很积极，有时又很消极。

大学以上文化的人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有13种社会职业，大学生的态度积极性排名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排名第7位，位于农民和自由职业者之后（分别于第5位和第6位）。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态度调查上，表示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大学生只有41.2%，文化科研人员只有33.8%，农民为59.7%，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之后。

大学生是一群理想主义的选举群体。如果外部政治环境好，他们对选举对象重视、对选举程序感到民主、公正时，他们会积极参与。他们对选举的价值和过程很看重。如果外界环境不好，或对选举的公正性有怀疑和对选举对象的作用失去

信心时，大学生的选举态度会来个180度的转弯，会成为最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选举的群体。大学生个性和独立性强，对选举的热情积极性常常服从于他自己的个人需要。可见大学生的所谓民主意识、文化素质、政治热情，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选举起作用的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还有一些因素是比文化、政治因素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和利益。

影响大学生参选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对选举程序的民主化程度和公正性的评价。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或者政治变革时期，认为选举程序有了民主化的改进，对选举公正性有信心时，学生们就会积极参加。选举对他们来说，有时不是为了追求实际利益，而是为了民主诉求。

习惯观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能力素质一直被低估。如在问卷调查中，“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列举了党、团员、干部、知识分子、学政治、法律出身的人、农民、普通市民、私营业主、个体户等6种人员。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这就是我们社会对农民的评价，认为农民的民主意识是最差的。

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的调查和访问，我们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调查数据都显示，农民对选举的态度积极性、认真态度和对选举改革的信心都排在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

一类。农村比城市的选举积极性要高（农村居民愿意参加选举的比例为81.6%而城市居民为72.8%）。在十几种职业人员选举态度的比较中，农民常常排在第四五位，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可见，以“政治素质”论定选民的参与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农民们有很强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而且能搞得很好。

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吗？

流行观念中，认为当今中国不能扩大民主选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在中国大地稍稍发生的农村民主选举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农村开始探索基层民主之路，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恰恰相反，许多发端在“问题村”，这些地方问题多，干部不团结，干群关系紧张，经济搞不好，群众意见大，上访多，社会秩序乱，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往往是在没有办法解决农村矛盾的情况下，才放手让群众去选举。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使社会由“乱”变“治”。

安徽凤阳县曹店乡土敏村就是一个典型。该村原是个问题村，村提留款收缴、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以及各项公益事业在全乡都是倒数第一，县里不时收到村党支部书记作风粗暴、多吃多占、增加农民负担

的控告信。在 1998 年 3 月 全县首届村支部书记统一换届选举中，原村支部书记 3 名成员由于在党外群众中测评 称职票 未过半数全部落马，普通党员陈德发在测评中得到全村 80% 群众的赞成票，当选村支部书记。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党支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全村落后面貌彻底改变，提留款收缴、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及各项公益事业名列前茅。这个村的民主效应影响了全县。县委书记说 民主选举后 县内没有发生过一起农民上访事件。

1991 年初，山西河曲县城关镇岱岳殿村爆发了村民集体上访事件。原因是少数党员控制了该村 村务不公开 财务管理混乱 领导班子不团结、搞派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终于发展到村民集体上访告状。后来镇党委贯彻落实《村委会组织法》通过“两票制”改造党支部和村委会大获成功，新班子由于得到群众拥护很有威信，大胆自理历史遗留问题，带领群众造粮田百亩 开果园百亩 使该村面貌焕然一新。该县和邻县其他几个有问题的乡镇相继效仿，都获得成功。

陕西省大荔县雷北村民主选举使一个动荡两年多的村走向安定。山东济南段店村 过去穷得出名 也乱得出名 上访告状不断 村里被公安局传讯的人就达 100 多人。自 1990 年群众自发选举村委会后，段店村连续 10 年没有上访闹事的 农民年均收入由 790 元增加到 1.6 万

多元。

民主选举解决了许多地方领导班子不团结 财务不公开、腐败、干群关系紧张，集体经济搞不上去的历史遗留问题。正是有了这种民主效果 才使民主选举制富有生命力。

民主选举能解决农村中长期难以解决的混乱问题 由“乱”变“治”。原因何在？农村乱往往是干部不团结、腐败 有的有经济问题 不尊重村民利益、办事不公、作风专断等原因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如果靠这些村干部继续管理村子，只能是越管越乱。靠上级领导指派干部 不能消除群众对政府的对立情绪或逆反心理。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让群众自己来选择他们的带头人，通过民主程序 就会选出公道和信任 群众信任的人 就会自觉服从领导。可是，一些人总认为没有选出领导想要选出的人就认为选乱了，这是以领导个人而不是以群众的满意为标准。

民主只是争取利益的手段

我曾在一篇报道村官选举的文章中 说出我的思考：“如果民主与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就热心参与；如果民主只是一项在上级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任务 他们就不感兴趣。”

我认为，决定人们参与选举的主要动因是 第一 选举的机构是有作用的。第二 选举程序民主公正，人们对选举达到预期公正的结果有信心。第三，也是关键的一点 选举行为与选举者有利害关系。选举没

有利益动机，再高素质的人也不会为纯粹的政治概念去投票。利益动机是选民选举的决定因素。如果一种选举制度缺少上述三种因素，那么这种选举就完全失去对选民的吸引力，变成了一种负担。要靠行政强制或靠经济利诱才会去投票。

与形式主义的选举相反，在真正搞民主选举的地方，群众在踊跃自觉参加中迸发出来的对选举的热忱和积极性，史无前例。

在山西原平市石寺乡下丰洼村，一名全身瘫痪的村里人躺在轮床上让人抬到选举现场竞选村委会主任并当选。谁说中国老百姓缺乏民主素质，没有能力行使选举权利？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民主热情，只是虚假的选举把他们堵塞。一旦选举能真正联系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热情就会迸发出来，而且表现出很高的选举艺术。

农民也许回答不出什么叫民主，为什么有选举制度，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利益”，他们的利益何在。这使我怀疑政治学者对政治的解释。如果把政治意识理解为纵论国家大事，深谙民主理论，那只有很少的人才能享有。但政治实质是一种利益，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公共活动。任何一个有健全理性的人都会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所在。为了保护他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就是政治。一种好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就是要使个人利益在社会中得到充分表达和保护，选举制度的

真谛在于能通过公民最广泛的参与，选出代表多数参与者意志和利益的人来。

若干年前，中国农民还是个完全听命各级领导，任人摆布的群体，被视为愚昧、自私、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农民视选举、村务决策权和村务知情权为生命，为罢免村官而上访、求助法律援助，成立理财小组要查账。他们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奋起抗争的事已不乏其例。我听到全国许多地方涌动愤怒的农民联名要求罢免不合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和腐败干部的消息。在湖北潜江市董滩村，有817名选民联合签名按上了手印，要求罢免不合法产生的村委会，当罢免案无人理睬，农民自发自费到县里、省里、到北京上访告状。当他们的正当合理要求被一再拒绝后，村民们请求法律帮助，向记者求援，并一再签名要求依法行使罢免权。当他们取得胜利后，群众的手掌都拍红了，村头有人放了一万响的鞭炮。同样的故事也发生浙江温州的许多地方。

他们在个人利益上是一盘散沙，斤斤计较，但是在争取民主选举权上又显得那么团结，那么充满激情，这充分反映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民主，而且也有能力行使好民主权利。因为民主对他们来说不是玄虚的理论，而是争取切身实际利益的手段。

（摘自《南风窗》）

经济怪才张五常 乐观看入世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莅穗做了一场精彩的主题报告。在他眼里，入世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入世对中国农业不是灾难

不少人认为，中国入世后农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导致农民失业。而张五常对此并不担心：“国内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会非常快，工业用地的资本回报率是农业的 10 倍左右，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也很高。这也将加速农民向市民的过渡。中国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应该占全国总人口的 60% 左右，一旦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农业人口的比例会降至 25% 以下。”

张五常说，中国农民的困难不是地少，而是知识少。

国产车迟早会卖到美国去

张五常说 关税下调后 短期内

进口车对国产汽车的冲击是难免的，但长期来看，中国市场不可能被进口车占领。中国的汽车工业在近年的进步，仅仅从身边的国产汽车的外形都可以看出来，而从长远来看，合资厂生产的汽车比进口车更具优势。一旦大幅减低进口零配件的关税，国内的车能够比国外的造得更便宜。他还乐观地推测，几年之内中国的汽车将出现在东南亚的市场上，甚至卖到美国去都不奇怪。

真正可怕的反而是过度的保护，台湾以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结果现在在香港连一辆台湾车都看不到。

通信业价格肯定会降下来

过高的通信价格对于吸引国外投资是不利的，从香港往深圳打电话比从香港打往美国的电话贵 5 倍，而从香港打往上海的电话费则比从香港打往美国贵 10 倍。

入世后，将使资讯业受到巨大挑战，迫使资讯业降低价格，提高服务。

（摘自《南方日报》）

语 丝

若想在困难之时得到帮助，就得在平日始终待人以宽。

（波斯）萨迪

命运为你选择亲戚，而你为自

己选择朋友。

（法）德利尔

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需要热情去灌溉，需要原则去培育，需要谅解去护理。

（德）马克思

（摘自《科学 24 小时》）

一个月内 5 位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

中国高层密集出访透视

□李文凯

既寻常又不寻常

进入4月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一系列密集出访，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4月8日至22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依次出访了德国、利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与伊朗等5个国家 在其行程近半之际，政府总理朱镕基即启程前往土耳其、埃及、肯尼亚3国访问；随即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于4月23日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并在访问完这两个东南亚近邻之后，于27日开始其令人瞩目的美国之行；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将前往欧洲 重点是访问英国。加上4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的日本之行 在短短1个月内，中国高层的5位重要领导人相继出访 对象国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庞中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金灿荣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福春4位专家学者。他们基本认为国家领导人的这一系列重要访问，并没有非常特别之处。因为按惯例，中国每年都会有两次高层频繁出访的高潮：一次是4月到5月，

另一次则在9月到11月间 形成中国的“春秋外交”。

金灿荣研究员说：“此次高层出访，其实还是中国一贯的全方位外交的表现。”他认为 这次高层出访有这样一个国际背景：“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的多边协调和交往比较频繁，而单个国家的传统外交活动则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中国目前只是恢复了这种正常的外交活动 但在这种背景下 就显得有些活跃了，难免会引发某些猜测与误读。

论证新的国际局势

很显然，对于目前的国际形势，中国高层领导人会形成自己的观点与判断 这些观点与判断 需要通过外交活动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交流沟通，在交流沟通中不断进行印证与修正，在无法形成共识时各自保留存异，在一致之处共同表达声音。而这样的交流印证，就需要出访尽量多的不同类型国家，听取尽量多样的分析与观点。

所以，中国领导人此次出访的国家中，有对国际局势最有影响力的美国 有地区性重要国家德国、英国、埃及 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尼日利亚、肯尼亚 有周边重要邻国日

本、马来西亚 还有被美国视为敌人的利比亚与伊朗。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这次出访中选择德国作为首站，表达了中国对欧洲的重视。德国统一后，在欧洲的地位上升，成为欧盟第一大国。而且 德国历史上曾经分裂 中国一直支持德国统一，德国显然会在台湾问题上比较理解中国的心情与态度。所以，江泽民主席在德国波茨坦重提历史，纵论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二战末期的 1945 年 7 月 26 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确认了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

另一方面，与去年中俄两国的频繁接触相对应，中国高层此番出访中没有俄罗斯的内容，说明中国已经认知到同俄罗斯相关的国际局势新变化。俄国借助反恐之机迅速向美国靠拢，通过对美国进入中亚（阿富汗）甚至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退出《反导条约》的默认 以及同北约的接近 向欧美表明 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不现实的“帝国野心”以及回归西方的决心。

“可以说 美国与俄罗斯现在已经在战略上达成了某种谅解。”王福春教授指出，“俄罗斯将来在国际事务上要采取彻底韬光养晦的孤立主义，中国失去了可以遮挡的一个重要国家 这对中国是不利的。”

所以，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应该在传统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上下功夫，要与尽量多的国家

交朋友，才能够尽可能多地为自己的发展任务创造条件。此次春季外交展示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审视近期中美关系

在美国独大的国际格局下，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日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各国同美国的关系 另一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否认的是 中国高层的此次集体出访 有相当的检讨中美关系的成分。

在“9·11”事件与反恐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今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后，中国原本期待中美关系会进入到一个和缓稳定的阶段。但布什访华回国后，连续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不友善的动作，试探中国的底线；并且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核打击的头号目标；而美军驻阿富汗司令在最近召开记者招待会时 提到了 60 多个支持美国反恐的国家，其中居然没有中国。这些事件实际上清楚地显示出，美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恐与对中国设防并行。

庞中英教授指出：“与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相反，布什的对华政策是‘遏制加接触’——先遏制 再接触 要把中国的所有势头都压下去后，再按照美国的条件同中国接触。这在台湾问题上体现得尤其突出。”

“面对这样的中美关系 中国要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影响与塑造。”金灿荣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对美策略

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与美国保持正面交往，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多样化的特征对美做工作，争取对华友好势力，避免中美对抗。

二是以广泛的多边外交去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10+3”会谈，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这个方向的表现。将自己的声音放在这些组织中进行表达，是一种外交上的智慧。

第三个方面则是加强自己的国力。

中国高层的这次春季出访，总体来说，就是前两种对美策略的贯彻。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利比亚和伊朗这两个被美国视为敌国的国家，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领导人出访利比亚与伊朗，并不表示中国在寻求抗衡美国。事实上，就算借助这两个国家，中国也平衡不了中美关系。

金灿荣研究员认为，跟这两个国家交往，是中国一贯的全方位外交内容，美国将它们列为“流氓国家”是要寻找敌人，而中国与美国不同，并不想树敌。

重视周边环境

周边国家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中国国内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边环境的稳定与友善；而在将来国际经济

领域的竞争中，东南亚国家也只能相互倚重，以地区为依托。

对于同东南亚国家重要而良性的关系，中国自然是要持续经营的。胡锦涛副主席在访美之前，前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访问，就是要表达中国对东南亚邻国的重视。

对于日本，中国则考虑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应该对之进行敲打。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日益同韩国采取协调步骤，对日本的出轨行为提出抗议与警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德国期间，明确提出支持德国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仅是中国加强中德关系、增强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权与国际能量的外交努力，同时至少还在客观上迫使同样在申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谨慎处理日中关系。

但中国显然非常重视同日本的关系。继李鹏访问日本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率领中共友好代表团又于4月25日赴日本大分县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关注中东地区

在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的5个国家中，利比亚、突尼斯、伊朗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另外，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穆斯林占总人口的47%。政府总理朱耨基出访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土耳其则是中东重要的

看透布什

□张国庆

拜“9·11”事件之赐，布什已成为美国人心目中与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同列的“伟大

非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

这未必是表明中国在试图同伊斯兰世界建立密切关系，但显然表达了中国对目前伊斯兰世界中出现的紧张态势的关注，特别是恶性循环不已的巴以冲突。这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中国同阿拉伯世界有着传统的友谊。对于巴以问题的关注，包含有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这些出访活动虽然不能起到斡旋调停的作用，但前往相关国家交换意见、表达主张与期待，也是中国树立自己爱好、维护和平形象的场合与机会。访问阿拉伯国家，关注巴以冲突，其实还有一个中国期待的弦外之音：希望中东问题能够回归到联合国的解决轨道上来。

另外，中国目前正在实现石油资源来源的多样化，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国内石油用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这一地区的稳定同中国的国内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关联。

从这次布局的上述特点来看，

总统”，但在他的内政外交中，各种“主义”混杂，言行举止看似矛盾。之所以需要读懂他，是因为每个国家都避不开要跟他目前领导的美国打交道。而要想读懂布什，还须从他的“老师”说起。

布什的三位老师：

小亚当斯、老罗斯福、里根

“9·11”事件之前，在家乡度假

基于对国际力量的判断与更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已经逐渐放弃过去一度看重的“三角外交”，走向更为务实的、全方位的“模糊外交”。

这种外交当然依然强调经营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对于必将越来越重要的周边关系，也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同时广交朋友，曾经是中国传统友谊纽带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重新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重点。

这样的外交，显然不是在刻意围绕某一个国家苦心经营，而是以国内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中国，有着清晰而特殊的国家利益。同美国正面交流、维护周边稳定、呼吁广泛的国际和平、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加强同尽可能多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往来……都是直接服务于中国能够潜心全力发展经济、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

（摘自《黑龙江晨报》）

时 布什认真阅读了有关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 6 任总统)的传记,他笑着对记者说:“你会发现 昆西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

布什与小亚当斯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出生在具有特权的新英格兰家庭,都是作为总统的儿子而入主白宫,都是在有争议的环境下当选为总统,但最相似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家主义。小亚当斯的国家主义观点是后来的共和党激进主义政治理念的先驱,它的内涵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扩大政府的影响力。

在布什放下小亚当斯传记后仅一周 就发生了“9·11”事件 而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布什摈弃了上台之初信奉的主张——淡化政府行为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不仅空前强化了总统权力,还在美国经济重振的过程中,日益表现出政府的强势作用,走上了与小亚当斯相似的国家主义道路。

布什的另一个老师是美国历史上最咄咄逼人的被称为“微笑的雄狮”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国际舞台上,老罗斯福推崇刚柔济的“大棒加胡萝卜”策略 逼对手就范。他从不打无准备之战,在大举动之前 都要做好情报工作 并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氛围。

这一切,布什与之如出一辙。无论是打击阿富汗,还是目前针对伊拉克的动作 都是提前收集情报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培植反对派、孤立敌人并选择最佳时机下手,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当然,他也不忘给相关国家以甜头,这种甜头有道义上的,有军事上的,也有经济上的,但与美国可能获得的利益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说,布什在小亚当斯身上学到了国内政策的精髓,在老罗斯福身上学到了对外政策的谋略,那么他在里根身上学到的则是如何做一个成功的总统。

无论是面对接手的烂摊子,还是上任不久的遇刺,抑或是后来的丑闻危机,都无法屏蔽里根的微笑和自信。里根认为,改变经济状况有 50% 要靠心理学。同样的,无论是史无前例的“9·11”恐怖袭击 还是经济萧条的阴影,都需要乐观主义精神去驱除。布什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他在国家危机中保持镇定,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保持乐观,在前景难测的阿富汗战争前表现了自信和果决,他鼓舞和安慰受伤的美国人民,也使自己成为了国家团结、稳定和自信的象征。

当然,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也对布什有相当的影响。这些共和党总统 小亚当斯是民主共和党人 但他的政治思想是后来的共和党人信奉的重要执政理念)一脉相承的强硬风格与布什的个性相契合,成为布什乃至这届美国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重要背景。

布什的三张好牌：
反恐、灵活外交、美元政治

布什现在手里有三张好牌，可以确保他实现绝大多数愿望。

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恐牌。对布什来说，反恐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 没有反恐 他决不可能得到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强有力支持；其次 反恐还是布什的挡箭牌 恐怖主义的阴影使得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人指责布什，至多只是批评一下他周围的人 第三 在反恐旗帜下 美国的各种力量空前团结，这使得布什在推行政治主张时少了“和平时代”的诸多阻力，得以从国内就开始实行他的“单边主义”，最后 反恐绝对有助于美国打击国际异己、占据战略要地 通过反恐 美国不仅如愿控制阿富汗 进驻中亚 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 还向菲律宾、格鲁吉亚、也门等国派兵或提供军事支援，并将枪口对准了伊拉克、伊朗等国。

就这样，“反恐”成为美国寻求实现其战略利益的绝佳借口。布什当然不肯轻易放手。3月27日 布什要求国会追加 270 亿美元的反恐经费时称：“在我看来 尽管 我的要求 可能有点高 但为了自由 付出再高的代价也值得。”将其中的“自由”换成“我和国家的利益”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布什的第二张牌是灵活外交。布什骨子里是固执的 比如对中国、俄罗斯的看法，对萨达姆的必欲除

之而后快，对推销美国价值观的执著，但在外交手腕上，他不乏灵活。这一点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先是全力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上毫不松口，可“9·11”事件后为了团结阿拉伯国家，却又出人意料地提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批评了沙龙政府，待到阿富汗战争大捷后，他又坚定地站到以色列一方 疏远阿拉法特 可眼下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以打击伊拉克，便又开始积极斡旋巴以冲突。

布什的第三张牌是美元政治。对布什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国际问题而是国内问题，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问题：经济实力决定着美国大棒的粗细，经济成果决定着布什的连任前景。

布什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在一片经济复苏的叫好声中，布什警告国民“不要高兴得太早”。3月18日 他对记者说：“尽管经济方面的消息是积极的，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走出森林。”为此 布什比以前更卖力地推行他的经济计划，支持国民的消费热情，使美国企业恢复活力。与此同时，他还加快了反恐步伐，提出核武计划 以刺激军工业的发展。

布什的三个理想：
连任、强化美国、全球美国化

布什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客，他是一个有明确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分成三个层次。